

蒙元壁画艺术

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文化丛书

• 张可扬 梁瑞 编著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蒙元壁画艺术

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文化丛书 • 张可扬 梁瑞 编著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蒙元壁画艺术 / 张可扬, 梁瑞编著. — 呼和浩特 :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15. 3
ISBN 978-7-5665-0747-1

I. ①蒙… II. ①张… ②梁… III. ①蒙古族—寺庙壁画—研究—中国—元代 IV. ①K879.4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52847号

蒙元壁画艺术

编 著	张可扬 梁瑞
责任编辑	敖全英
装帧设计	敖全英
出版发行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昭乌达路88号 (邮编: 010010)
联系电话	发行部: 0471-4993154/4990092 编务部: 0471-4990533
网 址	http://www.imupress.com
电子邮箱	imupress@163.com
经 销	内蒙古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永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320千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665-0747-1
定 价	260.00元

目 录

007	缘 起
009	第一章 蒙元壁画艺术的文化根源
019	第二章 蒙元壁画艺术与东西方文化的关系
021	（一）蒙元壁画同时代的汉地佛教壁画
041	（二）蒙元壁画艺术中汉地文人画样式的融入
046	（三）蒙元壁画同时代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湿壁画
056	第三章 蒙元壁画艺术中的藏传佛教壁画
059	（一）藏传佛教的派别与壁画中的主尊
064	（二）藏传佛教壁画中的动物观
077	（三）藏传佛教壁画的造像度量
085	（四）藏传佛教壁画的威仪
095	（五）藏传佛教的常识与壁画的题材
098	（六）藏传佛教壁画的构图形式
099	（七）藏传佛教本尊图示
143	第四章 蒙元壁画艺术在召庙壁画中的遗存
145	（一）元代蒙元壁画艺术
143	阿尔寨石窟
157	（二）明代蒙元壁画艺术
157	美岱召
171	乌素图召壁画
197	大召寺
239	席力图召
245	（三）清代蒙元壁画艺术
245	希拉木伦庙（大庙）
250	（四）和林格尔汉墓壁画艺术
259	第五章 蒙元壁画艺术中的视觉图形元素与现代设计
259	（一）蒙元壁画艺术中的视觉图形元素
260	（二）乌素图召壁画艺术的视觉图形元素分析与现代设计
271	（三）和林格尔汉墓壁画艺术的视觉图形元素分析与现代设计
286	后 记

蒙元壁画艺术

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文化丛书 • 张可扬 梁瑞 编著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张可扬 1973年生于内蒙古，1996年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系油画专业，同年留校任教，2005年毕业于俄罗斯国立师范大学造型艺术系油画专业，获硕士学位。现任公共艺术系主任，硕士生导师，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主要获奖奖项：三项国家级美展提名奖及优秀奖，八项自治区级美展金奖，四项银奖及内蒙古艺术创作“萨日纳”奖。2012年主持内蒙古自治区高校科研项目《蒙元视觉图形元素在内蒙古召庙壁画中的融入及演变》。

梁 瑞 籍贯山东省德州市，2002年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获硕士学位，主修水彩。现为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2004年研修于俄罗斯国立师范大学造型艺术系，师从俄罗斯人民艺术家博士生导师列德涅夫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艺术作品多次参加国家级美展并获奖。2012年参与内蒙古自治区高校科研项目《蒙元视觉图形元素在内蒙古召庙壁画中的融入及演变》。





大召寺／拉姆垂忠的伴神

目 录

007	缘 起
009	第一章 蒙元壁画艺术的文化根源
019	第二章 蒙元壁画艺术与东西方文化的关系
021	（一）蒙元壁画同时代的汉地佛教壁画
041	（二）蒙元壁画艺术中汉地文人画样式的融入
046	（三）蒙元壁画同时代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湿壁画
056	第三章 蒙元壁画艺术中的藏传佛教壁画
059	（一）藏传佛教的派别与壁画中的主尊
064	（二）藏传佛教壁画中的动物观
077	（三）藏传佛教壁画的造像度量
085	（四）藏传佛教壁画的威仪
095	（五）藏传佛教的常识与壁画的题材
098	（六）藏传佛教壁画的构图形式
099	（七）藏传佛教本尊图示
143	第四章 蒙元壁画艺术在召庙壁画中的遗存
145	（一）元代蒙元壁画艺术
143	阿尔寨石窟
157	（二）明代蒙元壁画艺术
157	美岱召
171	乌素图召壁画
197	大召寺
239	席力图召
245	（三）清代蒙元壁画艺术
245	希拉木伦庙（大庙）
250	（四）和林格尔汉墓壁画艺术
259	第五章 蒙元壁画艺术中的视觉图形元素与现代设计
259	（一）蒙元壁画艺术中的视觉图形元素
260	（二）乌素图召壁画艺术的视觉图形元素分析与现代设计
271	（三）和林格尔汉墓壁画艺术的视觉图形元素分析与现代设计
286	后 记



希拉木伦庙 / 百兽图

缘起

作为内蒙古人，总是对家乡有着深深的眷恋，童年记忆中的呼和浩特是灰色的，在旧城遍地青砖瓦房的胡同中不时隐现的是一座座寺庙，而这些灰色记忆中亮丽的色彩就来自寺庙里那一幅幅艳丽的佛教壁画。

从小受父亲的影响，对绘画艺术有着天生的亲近感，经常跟着父亲和他的学生们穿行在呼市旧城的大街小巷，那时候的旧城就像老北京的记忆，四合院，胡同，茶馆，牌楼，一切都是写生的天然场所。画画之余最吸引我的就是寺庙里的壁画，那时更多看到的是天神们狰狞的表情和他们手里拿的兵器。随着城市的发展，美丽的旧城一夜之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高楼大厦，寺庙也随之不断地被拆毁，而那些美丽的壁画也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上大学以后，城市的风景难以入画了，艺术家们背上行囊，走向还未被“文明”染指的乡间野地。为了学习中国古代的壁画艺术，人们涌向了山西的永乐宫，甘肃的敦煌……完全遗忘了我们身边的“玫瑰”。工作以后当我带着学生兴致勃勃地来到大召寺，给他们讲述我的童年记忆中的“大召三绝”之一的壁画时，修葺一新的寺庙中的老壁画不见了（现藏于呼市博物馆），取而代之的是，现代人重新绘制的佛教壁画，古朴的色彩没了，筋道的线条没了，古人与我们沟通的联系被割断了，就像一位老夫子的长袍被人换上了“比基尼”。

来呼和浩特旅游的人不是来看它有多现代的，是来看这个城市与众不同的历史的，而这些召庙中的壁画则是最容易与人产生共鸣和沟通的。当下我们最常亮出的呼和浩特的名片就是“召庙文化”，可惜的是这种文化的视觉体验实在是苍白无力，只能通过文字来把这种景象加以描述。

在众多的藏传佛教寺庙中，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就是美轮美奂的壁画，呼和浩特的大召寺、席力图召、乌素图召、美岱召，包头的五当召，鄂尔多斯的阿尔寨石窟，四子王旗的大庙等等，不胜枚举。它们吸收了西藏壁画的营养，又结合了中原壁画的形式美，造就了独一无二的少数民族地区古代美术的高峰，这是多么令人骄傲和自豪的瑰宝。但是当我们问起本地人对此的了解有多少的时候，回答的是“不知道”，“没听说过”，“没见过”。趋之若鹜地奔向大城市的博物馆去看古迹，却对自己家门口的艺术精品充耳未闻，本地人如此，外地人岂不更是闻所未闻了。好在艺术家是最敏感的，在我们的壁画课上，让同学们研究挖掘内蒙古的寺庙壁画艺术，并进行修复性临摹，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当下很多艺术创作也从这些壁画当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创造出了精彩的艺术作品，但是这样的工作只是个人的行为，缺少广泛的影响。这种紧迫感与使命感促使我们把蒙元壁画系统地以著作的形式进行一次梳理，让我们可以方便



大召寺 / 小王系魔

准确地了解古代藏传佛教艺术的辉煌。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化的建筑鳞次栉比，壁画作为彰显社会文明，美化生活，体现地域特色，传承传统文化的载体，成为建筑物不可或缺的装饰手段，因此在本书的后面着重阐述了如何恰当地将蒙元壁画的艺术特色转化成为现代设计的语言，以及蒙元壁画艺术对现代壁画设计的重要借鉴意义和可行性案例，为内蒙古地区的民族壁画艺术创作提供一些设计思路，为建设文化大区的宏伟目标添砖加瓦。

蒙元藏传佛教壁画在历经沧桑岁月的洗礼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色，剥落，变质，再加上人为的破坏，形成了千奇百怪的画面，各个寺庙的壁画内容原本大同小异，但由于各自不同的光阴打磨，每幅壁画都呈现出了独特的残缺之美。在叹息壁画离原貌越来越远的时候，突然发现令我们惊叹的视觉震撼，其实恰恰更多的来自于壁画残破后，形成的斑斑驳驳的肌理与色块的构成，因为这是自然力量的杰作，很多残破的画面本身就是一件完整的现代艺术作品，其内部原来所描绘的壁画内容基本上忽略不见了，这也就是艺术家们热衷欣赏这些残破壁画的原因吧。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如果这些寺庙壁画现在还像新画的一样，完美无缺，我们可能看起来就不会如此激动了。从现在开始保护还不晚，保护这些破旧的艺术品吧！就让它们破到这里吧！毕竟现在对艺术家们还有借鉴的意义。等到残破到剩下一堵堵白墙的时候……

我们的梦想是在不久的将来，在呼和浩特建立一座蒙元壁画艺术博物馆，把这些艺术精品，按照年代、风格、流派，系统地展示出来，成为我们真正的召庙文化的名片，成为内蒙古的“卢浮宫”，吸引世界各地的人们来朝圣这场艺术的盛宴。

第一章 蒙元壁画艺术的文化根源

蒙元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阶段和组成部分。元代的蒙古族主政者从草原来到中原，接受了中原文化，也带来了游牧文明，形成了特有的蒙元文化。早期的蒙古新字是蒙元文化的突出体现。这个在元代官方通用的文字，由八思巴受命创制，又称八思巴文。用这种新创制的蒙古新字，可以拼写其它各民族的不同文字。

蒙元文化是草原文化发展到鼎盛阶段的产物，是具有震撼力和影响力的蒙古族历史文化，蒙元文化有着鲜明的游牧文化特点。它吸收了中原农耕文化、印度文化和波斯文化，为中华传统文化注入了强劲的活力，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以成吉思汗、忽必烈为杰出代表的蒙元帝国在13至14世纪的辉煌，不仅实现了中国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结合，也打通了自唐末以来东西方300多年没有沟通的屏障，实现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特别是1260年忽必烈在锡林郭勒草原上建立了元上都，之后元朝同世界的联系更为广泛、深入，马可·波罗在元朝为官17年就是很好的例证。蒙元文化涵盖了蒙元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科技等诸多领域，彰显了13世纪至14世纪草原文明的辉煌历史。

蒙古民族是在额尔古纳河的滋润抚育下，起源于呼伦贝尔大草原的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成吉思汗创立蒙古汗国，对外大规模的军事扩张，是蒙古民族在人类历史上谱写的最为辉煌的篇章。元王朝的建立，加速了自秦汉以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是蒙古民族对于缔造我们伟大祖国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蒙古民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成了全国范围大统一的少数民族。元朝的大统一，使中国版图之辽阔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在多民族相互交融，多种文化因素的碰撞、锤炼中，形成了既有浪漫心态和纵横风格，洒脱于俗儒礼法之外的草原游牧文化，又有中原文化人伦程序、天人和諧的中庸之道，同时还



阿尔寨石窟 / 成吉思汗家族图

还包含着西方文化、阿拉伯文化、中亚和南亚文化内涵的个性鲜明的蒙元文化。蒙元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没有从官方角度提出“避讳”制度的王朝，它是思想文化禁锢制度最少的王朝之一，据统计蒙元时期的文化禁令仅是明清两朝的几十分之一。它还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

明确提出宗教信仰自由的朝代，当时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宗教在中国都有活动场所和信徒，这在当时整个欧亚大陆是绝无仅有的文化现象。

在元代文化体制中，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并存，既存汉法，又存蒙古法，蒙古语言文字是



乌素图长寿寺 / 罗汉

法定的官方语言文字，汉语汉字等语言文字仍然通用。忽必烈即位后，提倡“文治”，采用“汉法”，同时又多方维持蒙古传统，形成了中原传统政体和漠北旧俗共存的行政体制。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实际统治的范围、对象都发生了变化。政治形势的变化使经济、政策都发生变化。儒学是“汉法”的思想基础，孔子是儒学的象征，推行“汉法”要尊孔崇儒。忽必烈为了“文治”，采取了尊孔和提高儒学地位的措施，如在各地建立宣圣庙、恢复或新建各级地方官学、建立中央国子学、整顿和推行儒户制等。成宗铁穆耳下诏中外尊奉孔子，建立大都宣圣庙。武宗海山加封了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元代对孔子和儒学是尊崇和推行的，但有一定的局限性，科举制度一直未能全面实施就是一个例证。忽必烈统治时期，设置了若干与文化有关的机构。在中央设有翰

林国史院、国子监和国子学、蒙古国子监和蒙古国子学、秘书监、兴文署等。其他如太史院、仪凤司、教坊司等，都与文化有关，管理宗教则有宣政院、集贤院、崇福司、回回哈的司等。在地方有儒学提举司和各级地方官学、蒙古提举学校官和各级蒙古字学，以及管理各种宗教的地方机构。这些机构的设置，表明忽必烈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忽必烈即位后，封八思巴为国师，命他创制蒙古新字。至元元年（1209年）颁行八思巴蒙古文，作为官方文字使用，为此创办了专门学校，称为“蒙古字学”。在宫廷礼仪制度上，也体现了蒙汉二元性的特点。元朝皇帝有蒙汉两种庙号。如忽必烈的蒙古语庙号为“薛禅汗”，汉语庙号为“世祖”，铁穆耳的蒙古语庙号为“完泽笃汗”，汉语庙号为“成宗”。元朝共有八位皇帝具有双重庙号。这种双重庙号制度，反映了元朝政治文化的鲜明特点。中原传统的汉文化和特点鲜明的蒙古文化构成了元代文化的基本格局。畏兀儿文化、波斯文化对元代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各种语言的流行以及多种文字的使用，带来翻译人才的众多和翻译作品的发达。

蒙古族最早接触到的佛教是汉地禅宗，这一宗派与其他以经典为主的传教派不同，它不立文字，而以口、心传教。在金朝统治下的北佛教禅宗中的临济宗势力很盛。蒙古贵族灭金，在

中原建立统治后，极力拉拢临济宗著名僧人海云等人，利用佛教，以巩固其统治。1245年，蒙古国摄政皇后乃马真氏命海云在五台山作佛事。贵由汗即位后，令海云统领僧众。窝阔台汗时，以“居士”自称的耶律楚材掌握了行政大权，他曾当过佛门弟子，于是佛教在宫廷地位更为提高。1235年营建和林城时，同时也兴建了佛寺。耶律楚材《和林建佛寺疏》说：“龙沙玄教未全行，故筑精蓝近帝城；那垂手力，一轮佛日焕然明。”在和林万安宫遗址中发掘出来的壁画残片，多为佛教图画及佛像，这是佛教影响扩大的明证。

当时在蒙古地区，不仅和林城建有不少佛寺，连远在色楞格河以北靠近森林地区的边缘地带，也建造起佛寺。1953年，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考察队在库苏古尔湖以西、德勒格尔河北岸发现了一处元代城址和一块丁巳年(1257年)所立的石碑，冠以《释迦院碑记》的碑额。根据汉文碑铭，这是斡亦剌(外剌)部驸马和公主，为皇帝(蒙哥)和自身祈福而树立的碑记。这块释迦院碑的发现证明，由于蒙哥汗崇佛，上行而后下效，原是酷信萨满巫师的斡亦剌部贵族首领也成了虔诚的佛教徒。

到13世纪中叶，禅宗的地位开始下降，吐蕃的藏传佛教取代了禅宗，在蒙古贵族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蒙古皇室第一位虔信吐蕃佛教的应是阔端。窝阔台时阔端管

辖西夏地区以及青海、甘肃部分藏族地区。元定宗二年(1247年)，阔端于凉州会见萨迦班智达。萨迦班智达精通医学，曾为阔端治好了病。阔端为萨迦班智达建幻化寺。萨迦班智达多次给阔端讲教法，阔端给予萨迦班智达掌领吐蕃各教派的权力。当时道教与佛教明争暗斗。元宪宗八年(1258年)蒙哥汗命忽必烈在开平府



美岱召 / 供养人

宫中主持释道两教辩论《老子化胡经》的真伪，到场的佛教、道教、朝廷谋臣等共七百余人。在这场辩论中显示了八思巴渊博的知识和应辩才能，辩论的结果佛教获胜，道教败北，这也对蒙哥汗和忽必烈的宗教政策发生了影响。忽必烈下令将道士樊志应等17人送龙光寺剃发为僧，焚烧道教经典45部，将道士占用的237所佛寺归还佛教。

忽必烈时代，蒙古佛教信仰发展到鼎盛。因忽必烈本人好佛，他在“万机之暇，自奉施食，持数珠而课诵”。多桑也说：“成吉思汗后人之首先偏重一种宗教者，盖为忽必烈也。时

忽必烈业已皈依佛教。而佛教已开始传布于蒙古人中。”1253年吐蕃萨迦法王八思巴谒见忽必烈于潜邸。他所宣扬的吐蕃藏传佛教的道理，很容易地为忽必烈及其他蒙古贵族所接受，因此忽必烈及其妻室“皆秉受戒法特加尊礼”，元人危素云：“善佛之说行乎中国，而尊崇护卫，



乌素图庆缘寺 / 牛

莫盛于本朝。”可见在蒙古统治者的尊崇与倡导下，藏传佛教迅速传播。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继帝位，即封八思巴为国师，至元七年（1270年），又晋封为帝师。此后，封为帝师的先后有14位。至元七年（1270年），世世以吐蕃僧为帝师，成为元制，“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

拜”。在皇室倡导下，蒙古贵族接踵灌顶受戒，崇奉藏传佛教一时成为元朝皇室和达官显贵的时尚。元朝皇帝、后妃、贵族、官僚等不断营建新寺，元代在大都新建寺庙中最有代表性的有大护国仁王寺（大都城西高梁河畔，忽必烈皇后所建）、大圣寿万安寺（平则门内，即今白塔寺，忽必烈时建）、大承天护圣寺（西郊玉泉山下，元文宗时建）等。这些都是由吐蕃僧侣掌握的寺院，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很大势力，而人民负担也因佛事耗费而加重。

元朝诸帝中也不乏工于诗赋书画者，显示元代蒙古族已非入主中原前无文字的“蛮族”。如文宗图帖睦尔，有《登金山》《望九华》《青梅诗》等诗作传世。元顺帝妥欢帖睦尔也会作汉诗。《草木子》中录有他的诗作“鸟啼红树里，人在翠微中”，虽仅二句，但意境洒脱。元顺帝退出大都，北走塞外，在开平作了一首答复明太祖朱元璋招降书的七律《答“明主”》：“金陵使者渡江来，漠漠风烟一道开。王气有时还自息，皇恩何处不昭回。信知海内归明主，且喜江南有俊才。归去诚心丁宁说，春风先到凤凰台。”这封别致的“国书”，诗意盎然，又不卑不亢，还显示愿禅让的胸怀。陶宗仪对元文宗图帖睦尔作画有如下记载：“文宗居金陵潜邸时，命臣房大年画京都万岁山，大年辞以未尝至其地。上索纸，为运笔布画位置，令按稿图上。大年得稿，敬藏之。意匠经营，格法道整，虽积学专工，所莫能及”。元朝诸帝中，仁宗、英宗、文宗、惠宗（即顺帝）都能书写汉字，其中文宗和惠宗可称擅长书法，常书写字幅赐予臣下。据曾旁观惠宗妥欢帖睦尔作书的胡震宦说：“……及见始作字时，落笔如宿习，每精意审订，然后振臂一扫，不复润饰。”看来颇有书法根底。元代蒙古族画家小薛，以善画飞禽走兽闻名于世。还有张彦辅，他擅长画山水风景，名重一时。蒙古人中擅书法者更不乏其人。

陶九成《书史会要》记录元代蒙古族书家有脱脱、别儿怯不花、普花帖木儿、道童、拔实、松壑、那海、沙剌班、笃列图、兀良哈台、朵尔直班、也先帖木儿等人。在汉文化熏陶之下，蒙古族人士常以与汉族文人之间酬唱往来为风气。例如曾任吏部尚书中书参政、奎章阁大学士的阿荣与虞集等人相友善，“闲居以文翰自娱……所至山水佳处，鸣琴赋诗，日夕忘返”。曾任广东道宣慰使都元帅的僧嘉讷(字元卿)，著有《崢山诗集》；曾任翰林侍进学士的月鲁不花(字彦明)著有《芝轩集》(失传，只在他人著述中偶存数首诗作)等等。在元代蒙古族诗人中，以伯牙吾台氏泰不花和汪古氏马祖常最为著名。泰不花著有《顾北集》，他所写汉诗，各种体例运用自如。马祖常所作诗歌也颇具艺术魅力，史书中称赞他的诗“圆密清丽”。清代顾嗣立在《寒厅诗话》中称赞泰不花、马祖常等人“并逞才华，新声艳体，竞传才子，为异代所无”，可见其诗作被确认造诣颇深。可惜，元代蒙古文士所创作的大量汉文诗歌，因湮没散失，流传至今的已屈指可数。

公元1314年以后，元朝诸帝的汉文化修养有明显的提高，特别是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文宗图帖穆尔以及顺帝妥欢帖穆尔。从仁宗起，在尊尚儒学方面比前一阶段有很大的进步，主要体现在重新确立了科举取士制和加大尊孔力度。这些举措以官方名义确认理学是儒学正统，确立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还建立了奎章阁学士院、艺文监等新的文化机构，奎章阁后改为宣文阁，艺文监改为崇文监。这些都是重视汉文化的表现。仁宗以后的诸帝对各种宗教特别是藏传佛教的崇奉和爱好，远远大于儒学。他们耗费大量钱财兴建佛堂、道观，远非学校所能比拟，仁宗时命各地立帝师八思巴寺，其规制要大过孔子庙，这说明了儒学和宗教在统治者心中的不同地位。作为意识形态的宗教，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元朝宗教在社会各阶层的精神生活中占有头等重要的地位。元朝为了适应统治不同民族的需要对宗教采取兼容并蓄加以维护的政策(对反元的民间秘密宗教组织，如白莲教弥勒教，则严加禁止)，多种宗教并存，各种庙宇林立，多种形式的宗教活动连年不绝，声势之盛前所未有，成为当朝文化生活的



大召寺/罗汉